

中国中古史集刊

第二辑

张达志 主编



2016年·北京

唐前期西北的交通运输^{*}

——以西州为中心

古怡青（淡江大学历史系）

一、研究缘起及目的

唐代牧马对国防、经济与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新唐书》卷50《兵志》“监牧”条载：“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唐代前期的马政，因官营牧场的“监牧制度”，成为历代牧马最成功的时代，可见唐代马政与帝国兴衰息息相关。无论研究唐代政治、军事、经济，或中西交通与丝绸之路，都必须涉及唐朝的马政与传驿制度。

唐朝在全国建立完备的交通体系——传驿制度，包含由主要干道与支线组织成的纵横交错的传驿路线，星罗棋布的驿馆与马坊，

* 本文为笔者2015年度台湾科技主管部门研究计划（编号MOST104—2410—H—032—001）补助专题研究计划成果之一。拙稿撰写期间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学人，并曾以“马政与传驿——以唐代西北交通运输命脉为重心的考察”为题，宣读于2014年8月23—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承蒙评论人李芳瑶，及孟宪实、雷闻、罗彤华、赵璐璐、常晟、黄玫茵等诸位学者的宝贵意见及本刊张达志主编细心校阅，据此增补修改撰写而成，特此致谢！

及穿梭其中的马匹为主要交通与通讯工具，确保唐朝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转，也建立了唐朝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间的联系，奠定唐朝版图与统一的稳固。

唐代“监牧制度”仰赖广大的牧地，牧场尤其集中于西北地区。唐中期吐蕃趁安史之乱，首先侵扰陇右，唐代丧失西北陇右监牧的广大牧场，失去战马，又因藩镇之乱使国家对交通贸易的统一管理日渐式微。8世纪后半叶，迫于军费开支压力，国家财政转变，开始出现贸易垄断，使得唐代在军事、财政上面临窘迫的困境。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为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前后期历经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变化。

本文探讨年代以唐朝立国至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618—755）为限。安史之乱以前，唐政府以西北地区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之一，此处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更是馆驿网络最密集地区和交通用马最活跃地区，值得深入研究。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发现大量唐前期馆驿文书，为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反映唐代前期西北地区馆驿与交通用马的情况。

唐代马、驴等牲畜交易地点在哪里？目前学界缺乏深入论述，为拙稿探讨重点之一。斯坦因所获塔里木盆地遗址所出汉文写本，均为唐代文书。新疆地区所出汉文文书包含社会经济生活、行政管理、军政事务、交通运输、馆驿制度与宗教文化等方面，内容涉及层面甚广，为拙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中国幅员广阔，交通运输占有重要地位。历代水路运输较发达，史料记载也较详尽，学界研究成果较丰富^[1]；但史籍记载陆路运

[1] 相关研究参见〔日〕外山军治：《〈学界展望〉关于漕运的诸研究》，《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37年，第142—155页；〔日〕清木场东：《关于唐代漕运里程与脚直》，《产

输较简略,学界研究也相对较少^[1]。拙稿希冀在学界研究基础上^[2],从马政与传驿、监牧制度等面向着手,进一步论述唐代西州成为维系西北地区交通运输与政权运行的关键命脉,及其重要的价值地位。

二、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

唐代的公共交通网络,基本上是由首都与各州所建立的“驿道”及各州管辖下诸县联系的“县道”所组成^[3],不只用于公使往来的官方交通事务,亦可使用驿马与长行马,兼具私人经商贸的交通路线性质。沿线设置驿馆,为官人、公使、商旅提供运输传递和供给饮食、休憩与住宿。

唐代的驿以首都长安的都亭驿为中心,向全国设置主要干线。《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隋唐驿道的交通布局可分为七条路线:

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4]

(接上页)业经济研究》26-3,1985年,第512—489页;〔日〕清水场东:《唐代东南漕运路》,《产业经济研究》29-3,1988年,第490—459页;〔日〕清水场东:《关于唐代水运》,《中国水利史研究》35,1991年;张晓东:《汉唐漕运与军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1] 相关研究参见: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提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6—145页;孟彦弘:《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以交通与运输之关系为中心》,《唐研究》2006年第12期,第27—52页。

[2] 有关传驿制度研究参见拙稿:《唐前期马政的管理机构——以西州为重心的考察》,《淡江史学》第27期,2015年,第165—167页。

[3] 〔日〕荒川正晴:《唐朝交通系统》,《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40卷,2000年,第262—268页。

[4]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下》,“羁縻州”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6页。

这七条干线中，除两条为水路外，其余五条均为陆上交通。以长安都亭驿为主的七条路线中，尤以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的西北线为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的要道。

唐朝首都长安，面临突厥、回纥等北方强邻，及吐蕃的西方强邻，首当其冲之地为河套与西域地区，唐朝防御以黄河与西北方的驿道为重心，调配兵力与牧养军马才能形成长安西北方有力的防护网。

唐代在碛西地区创置最高军政长官为碛西节度使，有权调动安西大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兵力。但此职多为亲王并不赴任，形同虚衔，实际主管边防的军政长官为安西大都护或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唐玄宗后期安西副大都护与北庭都护，几乎都兼加节度使衔，故安西道实指安西节度使，北庭道实指北庭节度使。^[1]此外，还有因紧急任务而临时调集的行军部队，如疏勒军、玉河军、金牙军、萧乡军、金山军、昆丘军等。

唐朝的军是道下辖区最高军事单位，也是保卫西陲疆域的主力兵团，统辖数千至数万名汉军，屯驻于天山南北的各城重镇。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北地区部署重兵与战马，如安西节度使在安西大都护府，管戍兵 24000 人，马 2700 匹；北庭节度使在北庭都护府，管兵 20000 人，马 5000 匹；河西节度使在凉州武威郡，管兵 73000 人，马 19400 匹；陇右节度使在鄯州，管兵 75000 人，马 10600 匹。^[2]四镇共计兵 192000 人，马 37700 匹，远超过安禄山身兼三镇兵 183500

[1]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第 7 章“唐代碛西的军政建置与交通开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8—350 页。

[2] 《旧唐书》卷 40《地理志》，“河西道条”，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645 页。《通典》卷 172《州郡典》，“序目·大唐”条，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479—4482 页。

人、马 2600 匹，更超过关中招募彍骑十二万兵力。可谓唐代精兵猛将、精良战马全聚集于西北地区。

本文所指的西州为北朝的高昌国，源于十六国高昌郡，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隋炀帝时曾派裴矩驻张掖，主持西域联系及商业交通往来。隋末吐谷浑控制河西走廊，后来伊犁河下游、楚河、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一带被西突厥制约，通往西域商路一度被阻断。

唐太宗为重新开通西域商路，贞观九年（635）派大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率兵攻打吐谷浑，打通河西走廊。唐朝又挥军西进，平服高昌、焉耆、龟兹，恢复巴尔喀什湖以南及以东地区与内陆联系，达到控制西域、保护商路的目的。

隋唐击退西突厥后，丝绸之路发展达到鼎盛，在天山南北地区，先后设置北庭、安西都护府及都督府和州县，因保卫地方的军事需要，在军、镇、守捉驻扎军队，保护往来丝路客商的安全。

唐朝为积极地控制天山南北，贞观十四年（640）八月平高昌后，始置西州为边镇^[1]，下辖高昌、交河、蒲昌、柳中和天山五县。^[2]同年九月二十一日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3]，但仅维持两年，贞

[1] 以往史籍关于设置西州都督府记载混乱，但西州非西州都督府，两者为不同组织，《通典》卷 174《州郡典》，第 4558 页：“至大唐贞观十四年，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本高昌国界，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垦田九百顷。置都督府，后改为金山都护府，或为交河郡。”《旧唐书》卷 40《地理志》，第 1644—1645 页：“西州中都督府本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仍立五县。显庆三年，改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交河郡。乾元元年，复为西州。……高昌……贞观十四年，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相关论证，参见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5—367 页。

[2] 《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第 51 页：“（贞观十四年）八月庚午，……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

[3] 王永兴考证贞观十四年九月乙未朔，乙卯为二十一日，《唐会要》卷 73《安西都护府》作二十二日为误，应从《资治通鉴》卷 195，“唐太宗贞观十四年”条，以及《旧唐书》卷 3《太宗本纪》。参见王永兴：《唐代前期安西都护府与四镇研究》，见氏著：《唐代经营西北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3 页。



观十六年（642）九月，安西都护府由交河迁至高昌县。贞观二十二年（648），攻下龟兹（今库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地设置军镇，称“安西四镇”。高宗显庆三年（658），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为弥补安西都护府西迁后所造成的西州空虚，将西州升为中都督府，以加强防卫。唐朝在西州地区设置折冲府，为府兵的军府；高昌县设前庭府，属上等府，有1200人；交河县设岸头府，属中等府，有1000人；蒲昌县、柳中县设蒲昌府；天山县设天山府^[1]，与蒲昌府均属下等府，有800人。

唐代藉由西州得以进军西域。天宝元年（742）改西州为交河郡都督府，乾元元年（758）复为西州都督府。自此，除咸亨元年（670）至长寿元年（692）共22年西域被吐蕃所占以外，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前，唐朝一直有效控制西域，内地与西域交通畅通无阻。^[2]直到贞元七年（791）或八年陷于吐蕃后，唐朝才不能再控制西州。

三、西州为西北的交通转运站

西州地处天山东部南麓，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隐蔽的山谷草地，种植苜蓿、秋苡等粮草，兼有灌溉之利的绿洲盆地，可谓宜耕宜牧。

西州具有居中的地理位置，成为天山东部交通的总枢纽，交通路线四通八达。西州向东，进入河西走廊，经陇右达长安；向北穿越天山，进入北疆，达庭州、轮台，至弓月等民族地区；向西南，

[1] 参见拙著：《唐代府兵制度兴衰研究——从卫士负担谈起》附表二《唐十道折冲府数表》，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41页。

[2] 孙晓林：《唐代的西北交通》，《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第11—12页。

经焉耆、龟兹、疏勒，可达中亚各国。^[1]其地处中亚经济交流的要冲，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据点。

西州的交通线，东接伊州、瓜州、沙州与长安相通，西南接焉耆、龟兹，为东西丝绸之路的枢纽，北通庭州、北庭都护府，东南接敦煌。由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 Ma.No.301—Ast. III.4.095 号记录长行马最大活动范围以西州为中心，分为东线、西线、北线与南线四条大道（图 1）。

（一）东线：西州—伊州—凉州

由西州向东至伊州至长安路线如下：



西州往伊州的驿道有两条南北路径：一是伊西北路，即新开道；二是伊西南路，即赤亭道。此外，西州往东南至沙州有大海道，伊州至沙州有稍竿道，伊州至瓜州有第五道。

[1] 程喜霖考证 P2009《西州图经》记载西州的东、西、北三条道路是丝路西段最重要的一段，其中以中道为长安通西域的主要干道。参见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见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33—5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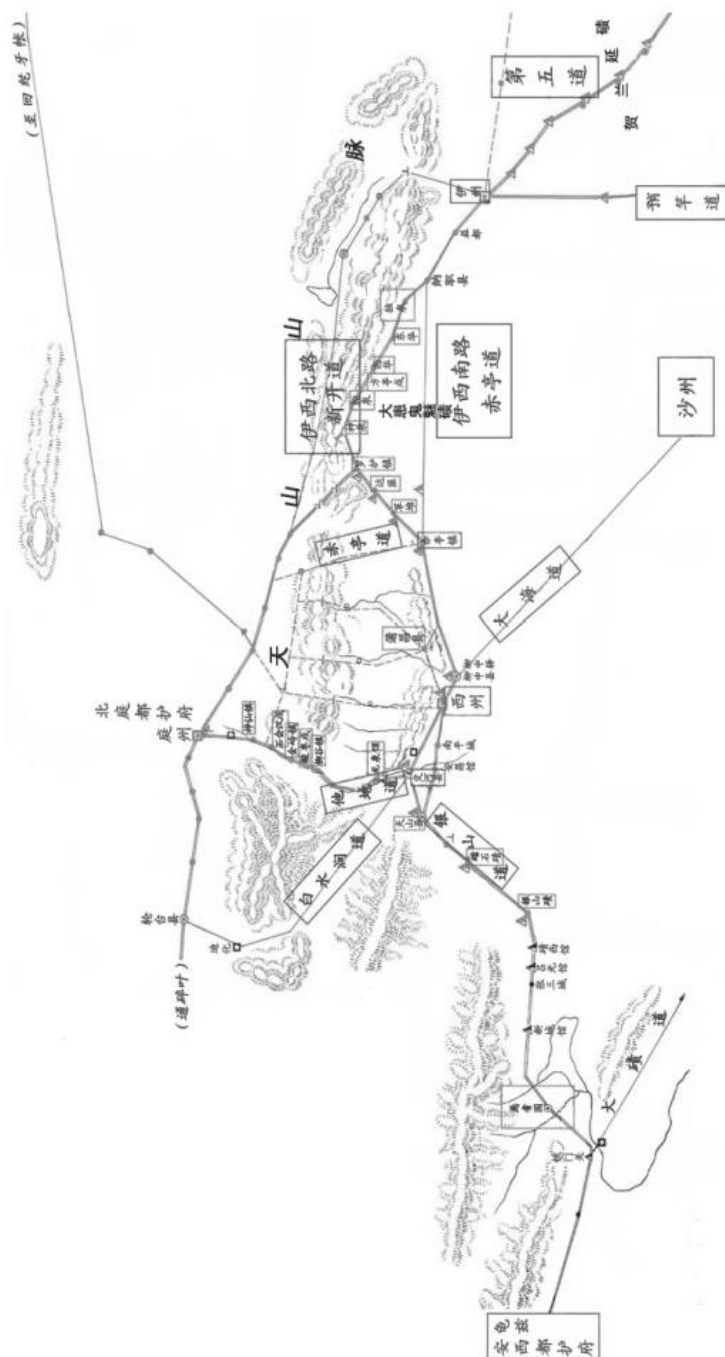


图1 唐代西州交通路线图

资料来源：本图绘制，根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图九“唐代瓜、沙、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图”修改而成，亦增补荒川正晴：《欧亚交通·交易与唐帝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第594—595页，附图3“8世纪敦煌·吐鲁番周边的馆·镇成分布图”。

1. 伊西北路（新开道）

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送迎客使常走伊西北路，见《西州图经》载^[1]：

5 新开道

6 右道出蒲□□

7 观十六年□□

8 有泉井□□

9 之阨，今见阻贼不通。

伊西北路（新开道）为贞观十六年（642）以后常用的新道，此条道路傍天山南麓而行，沿途多有泉水，另见《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2]：

41 伊吾县。在郭下。公廨三百一十一十五，户一千六百一十三，乡四。……

53 时罗漫山。与柔远县分管。源泉水。县北十里。第二水。县东北五里。

54 第三水，县东北九里。凡三水接临崖涌出，南流入碛即绝。火……

61 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廿。公廨二百一十五千，户六百三十二，乡七。……

66 城北泉，去县廿里，在坎下涌出，成湍流，入蒲昌海也。……

[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4页。

[2] 同上书，第40—41页。



又见《新唐书》卷40《地理志》“陇右道·陇右采访使·伊州·纳职”条注详细记载此道具体走向：

贞观四年以鄯善故城置，开元六年省，十五年复置。南六十里有陆盐池。自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萆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

伊西北路的新开道路线是由伊州西行，经过益都、纳职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过神泉，390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行经达匪、草堆，过190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南路（即赤亭道）会合。可见罗护守捉、达匪、草堆不在伊西南道的大患鬼魅碛内。此道里程比伊西南路（赤亭道）多160里，但水草充沛，便于行旅。

罗护是唐朝西州东线往伊州的要隘，地理位置关键。据编号Ast. VII. 2号墓出土《唐天宝八载罗通牒为检见在仓粮事》及《唐天宝八载罗通牒尾判》文书^[1]，可知罗护设有镇，镇有仓，仓粮由西州调拨供给。

吐鲁番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唐天宝十三载交河郡长行坊具一至九月厝料破用帐请处分牒》文书^[2]，透露出唐天宝十三载（754）交河郡长行坊给罗护馆的马厝料纪录。《唐天宝十四载柳中县具属馆私供马料帐历上郡长行坊牒》文书^[3]，柳中县上郡长行坊的帐历，报告诸馆坊马料，除由郡支供外，还因用支不够，向私家厝子李福儿

[1]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313页。

[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80—488页。

[3] 同上书，第436—443页。

贷便供给的明细账。

唐朝设立传驿制度，一方面为了战争防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供应驿使人马而设有馆驿。如《唐天宝十四载柳中县具属馆私供马料帐历上郡长行坊牒》文书记载^[1]：

86 〇〇别将朱承泰状称：在馆客使繁闹，准牒每季支帖马料参拾硕，并已食尽，季终

罗护除有镇、馆外，还有规模较大的马坊，马多达100匹。可见罗护馆应为大馆驿，供给往来客使非常繁忙。罗护不仅设馆驿，也设镇所，有伊州负责的烽戍，还有马坊、仓库。

2. 伊西南路（赤亭道）

由西州向东先抵达柳中、蒲昌，约再向东90里，到达赤亭镇，并建赤亭馆驿，穿越大患鬼魅碛，先经过方亭戍（今名十三间房），至纳职县（今名拉布楚克），抵达伊州。《西州图经》载^[2]：

2 赤亭道

3 右道出蒲〇〇

4 碛卤杂沙〇〇

此条交通路线为唐代赤亭道，又名伊西南路，通往伊州与西州的南道。^[3]《宋史》卷490《高昌国传》记载王延德《使高昌记》所走的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36—443页。

[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4页。

[3] 相关考证，参见〔日〕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书研究》，《东方学报》33，1963

路线：

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

此条路径虽走直线，里程近，但因是沙磧地，既无水草，又多热风，行旅多不行此道，而是循有水草的北路往来。伊西南路因道路平坦，里程近，尽管有风险，使者、马子、商旅仍常取此路通行或运送货物。如玄奘西行至伊州后往高昌，就是走伊西南路。^[1]

伊西南路上赤亭镇之所以成为“赤亭口”，在于其是伊州往西州南、北二道的交汇点，形成要冲关口，设有赤亭馆，馆内有长行马坊。^[2]据上述《唐天宝十四载柳中县具属馆私供马料帐历上郡长行坊牒》文书^[3]，赤亭长行马坊常备有马100匹，马坊总管为张景□，马厩料不足时，也从柳中县私家借贷。

据《唐神龙元年高昌县贾才敏等牒为长行马死方亭戍东事》编

(接上页)年，第267—314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磧西区》篇02《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第455页；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见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第538页。

- [1] 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涉南磧，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陈国灿考证伊州城与蒲昌城在同一纬度上，由伊州往西，以六天时间穿大沙磧南部，直达蒲昌城，只能走伊西南路。参见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第137—138页。
- [2] 唐高宗、武周时期，馆驿多称“驿”，如达匪驿、狼泉驿；唐玄宗时改称“馆”，如狼井馆、赤亭馆。参见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2000年，第85—106页。
- [3]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36—443页。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号 Ast. III. 4.083、084、089 Ma303 文书^[1]，神龙元年（705）四月，高昌县人贾才敏被差逐长行马六匹送往伊州，回至方亭戍东 30 里时，一匹马忽患急黄致死，当地为枯磧，马肉无人买，只领马皮交付公验，其余五匹马安全送到伊州。可见伊州往西州途中先经过方亭戍，才到达赤亭镇。^[2]

据斯坦因所获吐鲁番编号 Ast. III. 4 号墓出土《唐神龙三年赤亭镇牒为长行马在镇界内困死事》文书^[3]，马子赵某送押长行使阴质至伊州，回至赤亭镇东 35 里，长行马荡乏困死营内，主帅白文愬检校马确实为乏困致死，但沙磧之地马肉无人可卖，故弃掷不收，唯能剥马皮及印听从镇将梨月裁示，镇将判马子将马皮向州输纳，由史郭斌向伊州勾录事李文惠上呈牒文。

3. 大海道：西州—沙州—瓜州—凉州

由西州往柳中，东南通沙州，至敦煌的道路称为“大海道”。《西州图经》载^[4]：

22 大海道

23 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

24 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

25 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

[1]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37、264 页。

[2] 在此驿道上另有“方亭戍”，但未见有“赤亭戍”的记载，可能位在赤亭镇以东，应为两地，不应混为一谈。陈国灿认为马伯乐（H. Maspero, *Les Documents Chinois*, p.143 Ma303）误将“方亭戍”释为“赤亭戍”，相关考证，参见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37、264 页。

[3]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261—263 页。

[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第 54 页。

十六国时期此道仍有人马通行，但因穿越沙漠，缺水草，行旅必备饮水与粮食，途中又常遇流沙而迷路，此道艰辛如此，故人烟罕至，唐代多已废弃。因此由西州通往瓜州、沙州、甘州、凉州等地，均由伊州为转运站。

唐前期西北地区，除西州以外，伊州、凉州亦为重要转运站。凉州（今武威），西控西域，北阻回纥，南遏吐蕃，为唐朝西北重镇，地处中西交通安西入西域道的要冲，逐渐取代甘州，成为河西地区商业核心城市。^[1]由凉州至安西都护府相去 5000 里，有道通达，为唐代西通西域中亚的交通孔道，也是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亚的工具，故此道路为唐代国际交通的第一重要路线，全程皆置驿。^[2]

凉州武威郡设河西都护府，为盛唐时期西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极为繁荣。张籍《凉州词》：“无数铃声遥过磧，应驮白练到安西。”^[3]西州市场中能见到内地出产的纺织品，可知当时长安与西域间交通频繁、商贸发达。

凉州也是西州东线的重要运输转运点。据大津透等学者恢复的《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其内容记载了西州都督府接到中央尚书省发给金部旨符后所施行的度支奏抄。其中记载由剑南诸州所收的庸调送至凉州都督府管辖，每年伊州贮物 3 万段、瓜州贮物 2 万段，此或许为针对西域军事紧张形势所制订的军物运输规定。秦州也是凉州至长安之间的重要转运站，文书 H17—19 记载陇右道的秦州都督府及凉州都督府送纳绢等规定，F'1—E'1 是长川镇

[1] 相关研究，参见〔日〕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吉川弘文馆 1964 年版；宁欣：《隋唐五代的城市与交通》，见氏著：《唐史识见录》，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73 页。

[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2 卷《河陇碛西区》篇 10《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第 4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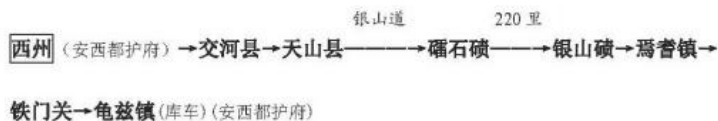
[3] 《全唐诗》卷 386 张籍《凉州词》，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4357 页。

一年所需物料由秦州计算贮纳，物资先送至秦州，再送到原州。^[1]伊州再将收到物资送往西州。可见唐代军需物资不是由两京运送，而是由度支掌握财政指示邻近各州直接送往边境。

凉州亦为西北运送马匹与流人的重要转运站，《唐六典·刑部》与《天圣·狱官令》“唐5条”均记载唐代将流移人集中在凉州都督府，再送至西州、伊州。^[2]由凉州都督府为主要转运点，派专使送至安西四镇、北庭地区，再分批运送至各地州县配所。安史之乱后，陇右没于吐蕃，所以不再流配西州、伊州。

（二）西线：西州—龟兹

由西州向西，经焉耆至龟兹的路线如下：



由西州向西行经交河县、天山县，通焉耆、龟兹往西南行的道路称为“银山道”。《西州图经》载^[3]：

35 银山道

36 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

37 沙碯卤，唯近峰足水草，通车马行。

[1] [日] 大津透：《日唐律令制的财政构造》第一章“关于唐律令国家预算”，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36、58页。

[2] 《唐六典》卷6《刑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90页，注云：“若妻子在远，预为追唤，待至同发。配西州、伊州者，送凉府；江北人配岭南者，送桂、广府；非剑南人配姚、嵩州者，送付益府，取领即还。其凉府等各差专使领送。所领送人皆有程限，不得稽留迟滞。”《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卷24《狱官令》（校录本），附唐5条，第340页。

[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55页。

银山道虽有沙碛，但水草足，车马仍可通行。《新唐书》卷40《地理志》“陇右道·陇右采访使·西州交河郡”条注记载较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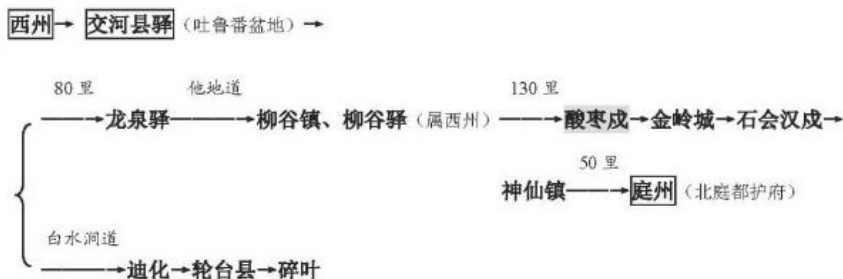
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碛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盘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

可知银山道沿途馆驿是西州城—南平城—安昌馆—天山馆—碛石馆—碛西馆—吕光馆—张三城守捉—新城馆—焉耆。

唐代西北边州的长行坊为直接归州县管辖的交通机构。以西州为转运站，马匹与草料先运到交河县，再依次送往天山县馆、碛石碛馆、银山碛馆。《唐开元十九年正月至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记载各县也设有长行坊和长行马。

（三）北线：西州—庭州（北庭都护府）

由西州向北至庭州（北庭都护府）路线如下：



西州往北的驿道有两条路径：一是他地道，二是白水涧道。

1. 他地道

他地道由西州往北通庭州，交河县驿北行80里至龙泉驿，向北

行 130 里至金岭城，为戍守重地。《西州图经》载^[1]：

29 他地道

30 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西

31 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

他地道出交河县界，向西北途中经属西州的柳谷镇，北行 180 里至庭州，庭州南 50 里为神仙镇，此道 450 里，足水草、通人马。^[2]由西州至庭州的交通要道，沿途设有馆驿，见《新唐书》卷 40《地理志》“陇右道·陇右采访使·西州交河郡”条注云：

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

由上述陈国灿考证他地道沿途馆驿：交河馆—石舍馆（龙泉馆）—酸枣馆—柳谷馆—金娑馆—石会汉戍—北庭。^[3]

据阿斯塔那 3 区 4 号墓编号 Ast. III. 4.094 Ma302《唐神龙元年西州都督府兵曹处分死马案卷》文书^[4]，马子高怀从西州领得长行回马，将送往北庭道上，经柳谷镇停留三日发向酸枣戍途中，长行马在柳谷镇南 5 里忽然急黄致死。因此请差典孙怀俊、高庆检校，确定长

[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1 辑，第 55 页。

[2]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2 卷《河陇碛西区》篇 14《北庭都护府通伊西碎叶诸道》，第 594 页。

[3] 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 9 辑，第 140—141 页。

[4]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 249—253 页。



行马病死属实，但勒令马子将死马剥皮肉收执，由柳谷镇状上西州听裁，牒文末有主帅胡元广、槽头翟德义、兽医车智隆、兵曹参军程待晷画押。

可知柳谷镇在防务、具体军事作战上，为基层军事机构，具体调度上，完全听命于西州都督府的兵曹参军或都督指挥。

2. 白水涧道

由西州至交河县、天山县往西，进山谷路，称白水涧道。《西州图经》载^[1]：

32 白水涧道

33 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

34 足水草，通车马。

白水涧道是沿着白杨河河谷穿越天山山谷，途经白水镇，达天山北麓的道路。此道水草充足，可通车马，但因直抵鹰娑川草原及突厥牧地，沿途设置烽铺，由于西域外患环伺，不设置馆驿，为西州面对西方的重要军事交通路线。

四、西州为西北的交通运输中心

唐代前期积极向西北开疆拓土，战争的军需品是由江南和剑南各州的庸调等赋税而来，以凉州、秦州为转运站，通过西北地区的驿道，运送到西北边境各军事要塞。由西北往内陆的交通路线中，西州为交通运输的转运中心，连接凉州、秦州与边塞驿道，具有重

[1]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1辑，第55页。

要的军事功能，与江南、剑南各州的税赋运输路线连在一起，成为支撑唐帝国的重要交通运输动脉。^[1]

以西州为中心的交通运输，可分为讯息传递、物资运输与人员传递三方面。

（一）讯息传递

由官府的公文书和官员、商旅往来的过所记录，可知西州为唐代讯息传递的转运中心。

1. 西州的官府文书

吐鲁番文书发现“西州都督府之印”、“高昌县之印”、“天山县之印”、“蒲昌县之印”、“柳中县之印”、“安西都护府之印”，印鉴款式大小相同，“均约五厘米见方，篆书阳文两行”^[2]，都是地方政府的正式官印，见图2“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发现印鉴”。

图2中“安西都护府之印”为贞观二十三年（649）文书，安西都护府已迁至高昌县。由于安西都护各自行文，西州刺史行文各县，同时期文书中并存“安西都护府之印”与“西州之印”，亦可证明西州与安西都护府隶属不同的组织。

此外，1981年8月初，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出土81SAT:2《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文书，唐代西州治所的高昌故城北面十余公里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东北十余公里的吐峪沟千佛洞就是文书中的“宁戎寺”和“丁谷寺”。文书具体年代为贞观十四年（640）至显庆三年（658）期间，文书大意为西州官府下宁戎寺、丁谷寺各征用一辆车牛的一件帖，钤有方形朱

[1] [日]荒川正晴：《唐过所与贸易通道》，欧阳晖译、朱新校，《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45页。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第8—26页。



图2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发现印鉴

资料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第13页。

泥“西州之印”印鉴一方，为现存西州唯一的印鉴。^[1]《唐西州下宁戎、丁谷等寺帖为供车牛事》为唐代西州的正式官方文书，证实西州行使地方政府征发徭役的职务。

由于西州在军政经济上亦具有重要地位，而唐武德七年（624）已改革行政机构，都护府设都护，都督府设都督，州设刺史。^[2]上述贞观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安西都护府设在西州交河城的两年期间，乔师望为安西都护府第一任都护。贞观十六年（642）九月，安

[1] 柳洪亮按照方位、道里推算高昌故城附近，就是文书中“宁戎寺”和“丁谷寺”，并指出“西州之印”为目前存世唯一的一件印鉴，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参见氏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364、370页。

[2] 《通典》卷172《州郡典二》，第4478页：“大唐武德初，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其边镇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领军戎。至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

西都护府由交河迁至高昌县后，郭孝恪以凉州都督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督西州、伊州、庭州诸军事，亦为安西都护府第二任都护。^[1]

唐代安西都护府初设时，辖西、伊、庭三州。贞观十八年（644）郭孝恪率兵出银山道，攻取焉耆。贞观二十年继续向西进军龟兹，都是履行安西都护的职责。唐代制度中，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属不同层级的机构，职能分明^[2]，可知安西都护府不可能亲躬西州事务，郭孝恪以安西都护身兼西州刺史，兼领军、镇两种不同身份，两单位合署办公，当为特殊情况。^[3]由于西域地广人稀、运输困难，边疆用兵多依靠当地物产，安西都护远征长达一年之久，表示西州自身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以便在安西都护府迁离后，从容应付多变的形势。

2. 西州的过所与公验

唐朝在首都和各州间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由州发放的“过所”与“公验”（即官方认可行牒）成为政府管理公私行旅的措施，取消运输税和交易税，建立官方认可离开“本贯”的行商和“兴胡”的登记制度^[4]，以便统一管理全国的商业活动。

藉由敦煌吐鲁番存世的公验过所文书记载行客路经的道路，可

[1] 参见《资治通鉴》卷196，“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条；《旧唐书》卷83《郭孝恪传》；《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抚士卒》。

[2] 《新唐书》卷49《百官志》，“外官·都护府”条，第1317页：“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旧唐书》卷44《职官志》，“州县官员·京兆河南太原等府”条，第1919页：“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

[3] 陈国灿亦论证永徽时期，安西都护府与西州合署办公，参见陈国灿：《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与唐史研究》，见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版，第295—296页。

[4] [日]荒川正晴：《唐过所与贸易通道》，欧阳晖译、朱新校，《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43页。

以了解唐代的交通情况，更可从中得知西州成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情况详见表1。

表1中，唐代七件公验过所记载行客皆以陆上丝绸之路中道西段的西州为枢纽站，作为转换公验过所的中心^[1]，向东、西、北都可走。西州向东沿伊西路经伊州、沙州、瓜州，过玉门关、凉州、兰州通长安；向西走银山道经焉耆，渡铁门关至龟兹；向北走安西路北道上的庭州（北庭都护府），经轮台，通碎叶。

由表1唐代过所中申请人的身份及所经路线可知，西州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民间的交通贸易路线。表1中《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石染典过所》^[2]文书中有五处朱印，文件首印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三印为“沙州之印”，尾部有“伊州之印”。开元二十年（732）石染典运驴十头欲往安西交易，希望通过铁门关镇、戍、守捉获准判给过所，但必先得到瓜州发给石染典的过所，其次是瓜州和伊州之间关防依次勘验，三月十九日得悬泉守捉高宾、常乐守捉官果毅孟进勘过的押印、三月二十日苦水守捉押官年五用勘验准予通过、三月二十一日盐池守捉押官健儿吕楚珪勘过押印，进而得到沙州与伊州的过所，直到四月六日伊州刺史张宾发给石染典在伊州的过所。由石染典所经的路径可知，他并未由瓜州穿越沙漠走第五道至伊州，而是绕道沙州略做停留再经稍竿道至伊州。再由伊州至西州，通过铁门关抵达安西。

由石染典过所可知，每经过一州，都得请求得到通往下一州的过所许可，持有过所便可脱离主驿道，在连通各州的官道上交易或旅行，可见过所不仅是单纯交易旅行的驿道，也具有紧密联系各州

[1] 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第219—221页。

[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3页。

表 1 唐前期西州的公验、过所与交通贸易表

项目	年代	审批机关	文书性质	申请人	交通路线	出处
公验过所						
唐贞观二十二年庭州给米巡职公验	贞观二十二年(648)	庭州	公验(副本)	兴胡米巡职	庭州—西州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 73TAM221:5
唐垂拱元年康义罗施请过所案卷	垂拱元年(685)	西州	请过所案卷	兴胡康义罗施等	安西四镇—西州—长安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 64TAM29:17(a), 95(a), 108(a), 107, 24, 25
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石染典过所	开元二十年(732)	瓜州	过所(正本)	兴胡石染典	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安西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 73TAM509:8/13
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给石染典公验	开元二十一年(733)	西州	公验(副本)	兴胡石染典	西州—伊州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 73TAM509:8/(a)
唐开元二十一年康益谦、薛光洮、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	开元二十一年(733)	西州	请过所案卷	唐益谦、薛十五娘 薛光洮 康大之	安西—西州—长安—福州 西州—陇右甘州 西州—轮台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 73TAM509:8/4-1(a), 23(a), 4-2(a)
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	开元二十一年(733)	西州	请勘给过所案卷	曲嘉琰 孟怀福 王奉仙 蒋化明 兴胡史计思等	西州—陇右临洮军 安西—西州—坊州 安西—西州—京兆府 西州—庭州 轮台—西州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 73TAM509:8/8(a), 16(a), 14(a), 21(a), 15(a)
唐年某往京兆府过所	开元末至天宝之初	西州	过所(副本)	年某	西州—京兆府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 72TAM228:9

资料来源：改编自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附表二“唐公验过所文书一览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219—220 页、308—309 页。

郡的作用。^[1]

(二) 物资运输

唐代中央交通运输的最高长官为尚书省户部中度支郎中、员外郎^[2],其下官方运输的指挥者“行纲”或简称“纲”、“典”,一般由州县官充任。雇佣劳动者,称“作人”,运输工具为车、牛等驮畜。

唐代出土文书中,常见北来、西来或东来的各地胡商或民间运输商队称如胡商史计思、作人史胡煞带羊200头、牛6头,别奏石阿六、作人罗伏解带驴2头,均从白水路至西州。^[3]文书中“白水路”当指“白水涧道”,胡商自轮台县经白水涧道至交河县,抵西州。《唐垂拱元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记载康尾义罗施年三十,带着作人曹伏磨、婢可婢支、驴3头、马1匹,从西来往东方京城吐火罗西域商队,路途中经过西州。^[4]胡商或商队在西州过境停留,目的是为了取得赴内地交易的过所,可见西州是丝路商队的贸易中心。

唐代西北地区由节度使兼管陆路运输,如伊州、西州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立节度使管理交通运输,有时由河西节度使兼长行转运使管辖^[5],如吐鲁番出土文书《检校长行使牒》^[6]:

[1] [日]荒川正晴:《唐朝交通系统》,第312—316页。

[2] 有关唐代前期马政管理机构,参见拙稿:《唐前期马政的管理机构——以西州为重心的考察》,第168—182页。

[3]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68页。

[4]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8—94页。

[5] 相关研究参见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9—141页。

[6]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347页。



- 1 勅检校长行使 牒西州都督府
 - 2 粟参拾肆硕
 - 3 牒，得西州长行坊牒，称上件粟，准使牒，每
 - 4 日合饲三百疋马。当为一十九日，马出使
 - 5 饲不满三百疋。每日计征上件粟，合征
 - 6 所由典张感 魏及 王素 泛洪 曹行，主帅卫
- (后 欠)

此牒文内容是征调西州长行坊出使马饲料粟，上有“左豹韬卫弱水府之印”，因西州属陇右道，所以由弱水府主管兼任陇右道长行使。

西州设有长行坊与馆驿，提供陇右道后勤的供给基地，由兵曹参军管理。至于西州长行坊所畜养马匹及驴、牛等，西州都督府设立有关军政事务、官吏往来及通讯交通的马坊机构，负责供给和调配西州境内的驿马。^[1]如《唐天宝十三载长行坊申勘十至闰十一月支牛驴马料帐历》记载牲畜的数量^[2]：

.....

162 廿二日两槽马。二百廿六疋，各七升；驴六十五头，各二升；牛一十二头，各四升。计壹拾柒硕六斗。

.....

上引闰十一月二十二日为西州长行坊在两槽的马、驴、牛匹数量最

[1] 乜小红：《吐鲁番所出唐代文书中的官营畜牧业》，《敦煌研究》2005年第6期，第70页。

[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67—479页。

多的记录,总计牲畜有303头。畜养在长行坊的牲畜,是储备给官员、使人随时乘骑所用。估计若加上派往各驿的马匹数量,约在千匹以上,这全由西州长行坊负责调度。^[1]

除马匹等牲畜运输外,马料也是供给马匹食用的重要粮草,唐代西北地区军粮来源分为三种,第一是由农民(课户、编户、主户、土户)负担课赋,伊州、西州、北庭、安西地区占全国约1/18。^[2]第二是各郡县屯田,陇右道总计屯田数172处,占全国总屯田数1039处的16.6%。^[3]天宝八年陇右道屯田收440902石,占全国1913960石的23%。第三是和采,中原的麻、丝等织品,通过军资、赏赐、货币流通等途径到达陇右道的新疆地区,此地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伊州、西州等。

如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共22件^[4],都是长行坊支付给各馆驿马料的帐历,除包括西州都督府管辖的高昌县、柳中郡、交河郡外,东至罗护馆、神泉馆,西至天山馆、碛石馆、银山馆。可见交河郡长行坊的马料运输是通过西州东线伊西北路达神泉馆,和西线银山道达银山馆。

又如《唐天宝十三载交河郡长行坊具一至九月蜡料破用帐请处

[1] 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第145页。

[2] 《通典》卷6《食货典》,“赋税条”,第111页:“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余米粟则三百六十万疋段(注云: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

[3] 《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屯田郎中条”,第223页,注云:“诸道屯田总数实有一千零三十九屯。……陇右道渭州四屯,秦州四屯,成州三屯,武州一屯,岷州二屯,军器四屯,莫门军六屯,临洮军三十屯,河原二十八屯,安人一十一屯,白水十屯,积石一十二屯,富平九屯,平夷八屯,绥和三屯,平戎一屯,河州六屯,鄯州六屯,廓州四屯,兰州四屯,南使六屯,西使一十屯。”

[4]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21—548页。

分牒》^[1]，天宝十三载（754）正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整九个月，共支2785.48 硕麦粟，上述《唐天宝十三载长行坊申勘十至闰十一月支牛驴马料帐历》^[2]，此文书完整记载自十月一日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整三个月，共支牛驴马料1456.77 硕。两文书数量相加正好是天宝十三载正月至十一月马料共4242.25 硕。如此庞大的马料运输，都需透过西州的交通网络来运送。

西州是丝绸之路上交通贸易的大市场，交易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税物、军用物资、官用物资、民间物资买卖等。从《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可知，西州市场有谷麦行、米面行、帛练行、果子行、□布行、彩帛行、凡器行、铛釜行、菜子行等。^[3]其中米面行的北庭面应是通过西州北线的他地道运至西州交易的。帛练行中有梓州小练、河南府的生绝、蒲州和陕州的绝；□布行中常州布、益州半臂段都是产自中原的商品，应自西州东线的伊西北路（新开道）或伊西南路（赤亭道）运至西州。此外，还有突厥敦马、草马，波斯敦父驼应是产自西域，自西州西线银山道输入西州，可见西州是东西方商品的交流、集散地。

西州是唐前期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唐朝派市马使到西州买马，维持战备。如《唐开元十九年康福等领用充料钱勿等抄》记载西州市马官天山县尉留聿典、伊吾军市马使权戡、陇右市马使廉三人等^[4]，来自各地市马使都驻守于西州，可见西州是供应马匹的重要市场。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80—488页。

[2] 同上书，第467—479页。

[3]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第447—462页。

[4]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402—405页。

又如唐神龙元年(705)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派甘州刺史李汉通率市马使团到西州市马。^[1]由河西地方官员组成大使、副使、判官等使团成员,说明市马可能是为了解决河西地区用马问题,或与久视元年(700)东突厥曾掠夺陇右诸牧监马万余匹,唐朝急需增补河西地区的军备有关。^[2]卖马者如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透过译语人何德力进行交易,以马3匹卖得20贯400文。^[3]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胡禄达干属胡禄屋部,三姓首领都担萨屈^[4]、延莫达干、禄俟斤^[5]等均为西突厥十姓部落的首领,可见西州是西突厥各部马匹的交易市场。

据阿斯塔纳509号墓所出三件有关石染典的文书,可知西州马驴等牲畜的市易经过。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五日石染典在西州以大练18疋,和三十四岁马主康思礼买骟敦六岁马1匹,文书中还有四十岁罗世那、四十五岁安达汉、西州百姓五十岁石早寒三位保人画指为记。^[6]同年二月二十日石染典以大练17疋,于西州市从西归人杨荆琬买青草五岁驴1头,此驴特征是近人膊有蕃印并私印,远人膊损,可见胡商杨荆琬将西域的蕃驴运至西州市易给石染典。^[7]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唐残牒》,第25页。

[2] 相关论证参见刘安志:《唐初的陇右诸军州大使与西北边防》,见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0—113页。

[3]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第41页。

[4]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第40页。

[5]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唐市马残牒》,第42页。

[6]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唐开元二十一年石染典买马契》,第48—49页。

[7] 同上。

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在西州“见有家宅及妻儿亲等”，石染典有马1匹、驴11头，开元二十一年元月二十三日得到过所，请往伊州市易。^[1]可知石染典以西州为集散地，在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及安西等地经商，从事牲畜贩卖。

（三）人员运输

西州长行坊馆驿，主要满足官府、军事需要，民间商贩也依靠此交通线，也是人员运输的交通要道，包括客使、军队、官员、商旅、民间行人、奴婢买卖等。前述“唐前期西州的公验、过所与交通贸易表”中，阿斯塔纳221号墓出土《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2]记载，庭州根民三十岁米巡职，为了将奴哥多弥施年十五、婢婆匍年十二、駝黄铁勤蹲八岁1头、羊15口至西州市易，而向庭州“请乞公验”，此交易的人畜应走西州北线他地道至庭州。

阿斯塔纳509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3]，孟怀福年四十八由安西镇发给过所，满放归兵回本贯坊州，但开元二十年（732）十月至柳中县时突患疹疾，不得不在柳中安置，每日随市乞食，仓曹参军李克勤判十月四日起由交河县递送程粮，户曹参军梁元璟十月七日下午牒责保过所。

同件文书中，前镇副使曲嘉琰，将男子清十六、奴乌鸡年十二、婢千年年十三、作人王贞子年二十六、骆敬仙年二十三、驴十头（八青黄、二乌）、马一匹驺，由于高昌县隶属西州，因此由西州都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唐开元二十一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第44—47页。

[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9页。

[3]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51—70页。

督府发给曲嘉琰过所,才得以从高昌县将人畜送往陇右临洮军。

吐鲁番阿斯塔纳 73TAM509 号墓出土《唐开元二十一年岸头府界都游奕所为查获无过所人王奉仙等解州状》文书^[1],提到开元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安西大都护府发给京兆府华源县人王奉仙回京的过所,受雇为行纲李承胤、驮主徐忠的作人运军需品到安西。同年十一月十日西州都督府勘验押过放王奉仙向东行,但至同月十四日赤亭镇官却勘过检无此人,行文至北庭都护府,王奉仙回程中因故被拘,审讯中详述原委。由西州都督府勘审后,得知王奉仙行经赤亭镇突然染病,因他为送军赐行纲的作人,得以受车坊接待休养 15 天。同月二十九日随同乡任元祥到蒲昌县,住在姓王的谦人家中超过 50 天以上。随后得知欠他 3000 文钱的张思忠来到西州境内,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王奉仙从蒲昌县追赶张思忠,至二十五日到酸枣戍。^[2]王奉仙没有追上张思忠,自己却在酸枣被戍家捉来,后来行文才得知王奉仙不是从诸军镇逃走。

而王奉仙之所以被拘,是因从安西返京,应走银山道往东至西州,接着走西州东线伊西路至伊州,再往东返回本贯京兆府华源县。王奉仙返乡路程应一路由西往东行,但却在西州北线往北庭途中的酸枣戍被捉获,没有向北庭行文,而勘无过所。

西州也是买卖胡人奴婢的重要市场,各地官员和商人常在西州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7 期,第 19 页图版 12、13。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 58—61 页、第 63—65 页。

[2] 学界对此文书多有论述,参见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文物》1981 年第 1 期,第 61 页;〔日〕荒川正晴:《关于唐对西域布帛轮迭与客商活动》,《东洋学报》第 73 卷第 3、4 号,1992 年,第 44 页;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提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136—138 页。



买奴婢，如阿斯塔纳 509 号墓《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1] 中米禄山身份是“兴胡”，即为了兴生利而贸易贩卖的胡商，米姓应属昭武九姓的胡人。米禄山带着年十二的婢失满儿，于西州市场以练 40 疋卖给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后，请求西州都督府给市券，证明买卖的合法性。同墓另有《开元二十年薛十五娘买婢市券》^[2]，汉人田元瑜得到官方认证的“行牒”，将年十三胡婢绿珠，于西州市以大练 40 疋转手卖给妇女薛十五娘，可见西州常有奴婢的买卖交易。

五、结论

马匹为唐朝主要交通与通信工具，马政管理与调度是确保国家体制正常运转的关键。

唐代积极经营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唐朝灭高昌，进击焉耆、龟兹，统一西北地区，并设置安西都护府作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总部。西州都督府经常负责征集、管理、调度的任务，西州在军事上，不论人畜运输都具有极重要的需求与地位。

因此，马匹对维持唐代前期西域地区安定的政治形势，保证唐代中央与西域之间政令信息的传递与军政官员往来，具有重大的功用。

新疆出土文书出现长行马坊的交通组织，在没有驿传的边境地区，设置长行马的管理所，作为驿传网络的辅助组织。从吐鲁番文书中发现唐代前期有长行马文书，反映出唐代前期活跃在西域地区的长行马为当时西域官方迎送使命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唐代在西北马场集中牧养与管理马匹，再将马匹运送至中央或

[1]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 264—265 页。

[2] 同上书，第 266—267 页。

地方各单位。从出土文书看来，西州为唐代运送物资的集中地，主要分布在长安西北部，形成长安西北方的防护网。

西州为唐朝西北马匹的集中地，再运送到安西、北庭都督府的集散地。东线从长安出发经原州—秦州（秦州都督府）—兰州—凉州（凉州都护府）—瓜州—沙州—伊州—西州（安西都护府），西线为西州（安西都护府）—焉耆—龟兹镇（安西都护府），北线为西州（安西都护府）—庭州（北庭都护府），共三条大道。西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唐朝传驿制度得以顺利运转，除了有中央政府以律令制统筹管理的公文书及过所外，各州县也集结在地社会的力量，形成行政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此外，不同阶层的公使、行旅或胡商递送税物、军物、粮食、人马等物资，也是传驿制度形成的基础。